

# 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sup>\*</sup>

张文宏 阮丹青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 1996 年“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的问卷调查资料, 对市民和农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了比较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 (1) 亲属在城乡居民的财务支持网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 亲属在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 但不如其在财务支持网中那么重要。亲属在财务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有程度上的差别, 而这个倾向在农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3) 在亲属中, 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着比父母更大的作用, 特别是在财务支持网中。子女在财务和精神支持网中发挥的作用都非常小。配偶在精神支持网中发挥的作用也相当弱。(4) 同事和朋友在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比其在财务支持网中更大。在农村, 邻居在财务支持和精神支持两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文化和结构两个方面对这些研究发现进行了解释。

社会网是指由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个人的社会支持网是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程度的人所组成的。社会支持网在规范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它也是个人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从一般意义上说, 社会支持指人们从社会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财务支持和精神支持是个人社会支持的两个重要方面。本文的分析仅仅限于财务和精神领域的帮助。

社会学家长期以来认为, 个人从来都不能自由地选择他们希望交往的对象。社会生活对他们施加的限制影响了其对交往对象的选择。同时, 虽然文化价值观念规定了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倾向, 但社会结构因素(例如政治和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及一个社会中的人口构成)对建立和维持个人间的关系具有某种影响力(Blau and Schwartz, 1984; Coser, 1991)。由于个人间相互交往的关系模式是最基本的社会事实之一, 所以社会学自创始之时就把微观社会模式和宏观社会限制之间的联系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中心关注点。跨社区的比较研究是探讨宏观社会条件对微观社会关系模式影响的最好方法之一。

一种社会角色的相对重要性和这种角色在某种支持网络中发挥独特功能的程度受到结构和文化两方面的限制。换言之, 提供特殊支持的人的身份和其有效性在不同的社区受到不同社会条件的制约。西方的一些同类研究表明, 亲属和朋友在个人社会支持网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亲属当中, 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比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的作用更大。另外, 配偶提供社会支持的范围也是最广泛的, 人们倾向于从配偶那里获得精神性、工具性和社

\* 本文是“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网”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该项目的研究获得了美国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学术联合会(ACLS)的资助。感谢边燕杰博士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交性的支持,父母和成年子女也彼此提供精神性和工具性的支持,但西方人向朋友寻求的主要是精神性的支持,邻居作为社会支持网的成员主要是由于其在地理上的邻近性,而同事在社会支持网中仅仅发挥着边际性的作用(Burt, 1990, 411—451; Finch, 1989; Fisher, 1982; Marsden, 1987; Van der Poel, 1993; Wellman, 1979, 363—390; 1992, 74—114)。

韦尔曼和沃特利(Wellman and Wortley, 1990, 558~588)认为,社区关系并没有随着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而普遍衰败,只是居住在不同社区的人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建构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时会采取不同的模式。他们的个人社区理论不仅影响了社区关系理论的发展,而且对日常生活中各种支持关系的网络结构的分析具有独到之处。阮丹青等(1990, 1997)对天津城市居民“重要问题讨论网”的研究指出,亲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在讨论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特征是高趋同性、高紧密性和低异质性。1993年同1986年相比,同事和亲属在讨论网构成中的重要性下降,而同学、邻居和朋友的重要性上升。边燕杰(1997)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表明,人们更经常地利用强关系(密切关系)而非弱关系(一般关系)去获得一份理想的工作。使用间接关系的人比使用直接关系的人更容易找到较理想的工作。蔡禾等人(1997)的研究发现,人们通过何种社会关系去寻求社会支持,受到社区性质和社区居民自身特征的影响。

然而,关于中国农民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或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网的比较研究,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不研究中国农民的社会网,就不能完整和系统地理解和认识中国人的微观社会结构。本文运用1996年“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问卷调查的资料,对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社会支持网的规模、网络构成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发现其类似性和差异性及其造成这种类似性或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

## 研究方法

1. 抽样方法。本文所用的资料来自“天津城乡居民的社会网研究”,调查地点是天津市城市中心区和农村地区,调查时间为1996年11月至1997年3月。

城市样本:天津市中心6区共有123.07万户,368.71万人。中心6区共设有101个街道办事处、2144个居民委员会(天津市统计局,1996,77,45)。城市样本是按以下方法抽取的:(1)从中心6区中的每区随机抽取3个街道办事处,共18个街道办事处;(2)从抽出的每个街道办事处中随机抽取1个居民委员会,共18个居民委员会;(3)从抽出的每个居民委员会中再按照居民户口花名册随机抽取33户左右的家庭;(4)在每个被抽取的家庭中,抽取18岁及18岁以上、生日最靠近11月5日的城市居民作为本次调查的访问对象。城市地区共获得有效样本601个。

农村样本:天津市的农村居民分布于4个近郊区、3个滨海区和5个县。4个近郊区和5个县的农村居民为360.43万人,占天津市农业人口的93.2%(天津市统计局,1996,78)。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加上受研究经费的限制,农村样本的抽选区域限定为4个近郊区中的西青区和5个县中的宝坻县。宝坻县的人口规模、农村工业化水平、农民人均收入、县城到市区的距离,在5个市辖县中均属于中等。4个近郊区都与市中心区接壤,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农民人均收入、人口规模差异不大。因此,选择西青区、宝坻县抽取农村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天津市统计局,1996,447—464)。农村样本的抽取程序是:(1)从西青区随机抽取3个乡镇)、从宝坻县随机抽取4个乡镇);(2)从抽出的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3个村民委员会,共

21个村民委员会；(3)从抽出的每个村民委员会中，再根据农民家庭户数占抽样总体的比例，从户口花名册中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户(30户左右)；(4)在每个被抽取的户中，再抽取18岁及18岁以上、生日最靠近11月5日的农村居民作为本次调查的访问对象。农村地区共获得有效样本598个。

本文的分析包括18—65岁的503个城市样本和334个农村样本(即宝坻县的样本)。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见表1)。

	农村 (样本数=334)	城市 (样本数=503)
性别		
男	54.5	38.8
女	45.5	61.2
婚姻状况		
未婚	4.2	7.4
已婚	94.9	85.4
丧偶	0.9	6.0
离婚	0	1.2
年龄		
18—29岁	15.6	11.9
30—39岁	35.6	22.1
40—49岁	35.0	29.2
50—59岁	9.6	19.7
60—65岁	4.2	17.1
平均年龄	38.9岁(标准差=9.7)	44.7岁(标准差=12.3)
教育程度		
文盲或略识字	9.9	6.2
小学	32.9	9.9
初中	41.6	35.8
高中	14.4	31.0
大专	1.2	14.7
本科及以上	0	2.4
平均受教育年限	7.14年(标准差=2.66)	9.96年(标准差=3.46)

<sup>\*</sup>本文的分析只包括了18—65岁的样本，其中农村的样本仅包括远郊区(宝坻县)的样本，不包括近郊区(西青区)的样本。

2. 量表设计。问卷的第一部分是关于被访者本人的背景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和收入等指标。第二部分所包括的个人社会支持网的11个网络问题，参考了美国和荷兰社会学家的设计方案(Burt, 293—339, 1984; Van der Poel, 1993)。本文涉及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财务支持网成员是按照如下问题选择的：“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精神支持网成员的选择标准则是下面的问题：“如果您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您会找谁呢？”。在访问中首先由调查员依次记下被访者针对每个问题所得到的所有人的姓名，然后再由调查员集中询问被访者所得到的前5个人的详细情况，<sup>①</sup>包括这些人的性别、

<sup>①</sup> 为了寻求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的可比性，我们在每一个网络问题中最多收集了前5个网络成员的资料。

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单位的所有制形式、政治面目、与被访者的关系等深层次资料。因此，被访者在上述两个问题之下提到的人分别成为本文分析“财务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的网络成员。

关于被访者与社会网成员的具体关系，我们在问卷中列举了 32 种可能的关系。<sup>①</sup>当然，被访者与某个网络成员的关系不一定只有 1 种，但在我们的资料中，95% 以上的被访者只提到 1 种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在我们的统计中，并没有对被访者提到的网络成员的多重关系做进一步处理，这里只分析了被访者提到的与网络成员的第 1 种关系。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在统计过程中又把 32 种关系进一步归纳为 9 种：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他亲属、同事、朋友、邻居和其他非亲属。

本文将集中分析城乡居民社会网的两个方面：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模式。网络规模指构成一个人的社会网的全体成员的数目。网络规模是测量一个人的社会资源拥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网络构成模式指被访者与网络成员的具体关系，通常用某种特定关系占总关系的百分比来表示某种关系的重要性。在本文的分析中，不包括年龄小于 12 岁的网络成员。在社会网构成的分析中，不包括网络规模为零的被访者。

## 研究发现

本部分将首先描述城乡居民财务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的一般特征，然后对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类似性和差异性进行比较。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民和农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究竟有多大？他们向什么人寻求特定的社会支持？

表 2 描述的是财务支持网的情况。就农民的财务支持网来说，它的平均网络规模是 2.1 人，3.9% (13 人) 没有提到任何人。关于网络构成，很明显，农民更可能提到亲属而不是非亲属。如表 2 所示，平均 67.7% 的财务支持网是由亲属构成的，76.7% 的农村被访者至少提到了 1 名亲属 (见表 2)。

在亲属关系中，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比父母和子女发挥着更大的财务支持作用，前两种关系的平均百分比高出后两者的 2 倍以上 (27.6% + 21.9% 对 14.3% + 2.7%)。31% 以上的农村被访者至少提到了 1 名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只有 18.6% 的被访者提到了父母。对“其他亲属”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提到的其他亲属中，有 44% 比被访者年长 6 岁以上，有 34% 与被访者的年龄差距在 5 岁以内。在非亲属关系中，同事、朋友和邻居的构成百分比及被访者提到该关系的比例类似。

市民的财务支持网呈现出与农民类似的特征。市民的平均网络规模也是 2.1 人，11% 的城市被访者 (54 人) 没有提到任何财务支持网成员。像农民一样，市民也更可能提到亲属而不是非亲属作为其财务支持网的成员。在财务支持网中，平均 60.5% 的网络成员是亲属。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比父母和子女发挥财务支持的功能更强 (21.3% + 17.2% 对 9.3% + 10.6%)。在提到的其他亲属中，有 29.5% 比被访者年长 6 岁以上，有 28.4% 与被访者的年龄差距在 5 岁以内；与农民不同，市民的同事和朋友比邻居发挥着更大的财务支持作用，这可从

<sup>①</sup> 这 32 种关系是：同事、上级、下级、生意伙伴、同学、朋友、恋爱对象、邻居、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子女的配偶、孙子女外孙子女、配偶的兄弟姐妹、祖父母、配偶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配偶的外祖父母、叔叔姑姑、舅舅姨、配偶的叔叔舅舅、侄子女、外甥子女、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配偶的堂表兄弟姐妹、配偶的侄子女甥子女、同家族成员、其他远亲属和其他关系。

表 2 中这 3 种关系在网络构成中的比例发现。

表 2 城乡居民财务支持网的构成

	农村(N=317) 典型网的关系构成 (平均%) <sup>a</sup>	(标准差)	被访者提到该关系的%	城市(N=446) 典型网的关系构成 (平均%) <sup>a</sup>	(标准差)	被访者提到该关系的%
全部亲属	67.7	(43.7)	76.7	60.5	(44.5)	69.5
配偶	1.2	(6.0)	4.1	2.1	(9.7)	5.6
亲属	66.6	(44.3)	74.5	58.4	(44.1)	68.4
父母	14.3	(32.6)	18.6	9.3	(24.5)	15.9
子女	2.7	(15.6)	3.2	10.6	(27.6)	14.8
兄弟姐妹	27.6	(40.5)	36.9	21.3	(33.8)	34.8
其他亲属	21.9	(36.4)	31.2	17.2	(30.6)	29.4
同事	8.9	(23.9)	15.5	14.9	(31.4)	21.8
朋友	11.8	(28.5)	18.0	12.0	(29.1)	17.5
邻居	9.9	(24.8)	16.7	6.9	(21.8)	11.7
其他非亲属	1.7	(8.7)	5.1	5.7	(19.8)	9.2
网络规模 <sup>b</sup>	2.1	(1.4)		2.1	(1.4)	

说明: a 配偶+亲属=全部亲属;全部亲属+同事+邻居+其他非亲属=100%。

b 农村样本=330,城市样本=500,包括那些没有提到任何网络成员的个案。该样本数与表 4 的回归分析中网络规模变项所包括的样本数一致。

表 3 描述的是精神支持网的情况。农民精神支持网的平均规模大于其财务支持网,平均规模为 2.6 人,1.5%的农民被访者(5 人)没有提到任何网络成员,即其网络规模为 0。亲属关系虽然在精神支持网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它的作用不如其在财务支持网中那么明显。如表 3 所示,在精神支持网中,平均 57.5%的成员是由邻居、朋友、同事和其他非亲属构成的。换言之,非亲属在农民精神支持网中的重要性大于亲属(见表 3)。

在亲属当中,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着比父母相对重要的精神支持作用,而子女的作用非常弱。在提到的其他亲属中,有 37.2%比被访者年长 6 岁以上,有 46.1%与被访者的年龄差距在 5 岁以内。配偶的精神支持作用令人惊奇地小。衡量一种关系是否重要,不仅要看其在网络构成中所占的百分比,还要看被访者提到该关系的比例。在本次调查中,虽然 94.9%的农村调查对象是已婚者,并与其配偶居住在一起,但是,仅有 23.7%提到了配偶;在非亲属当中,朋友和邻居的精神支持作用相当明显。事实上,33.9%的农民被访者至少提到了 1 名朋友,38.3%至少提到了 1 名邻居。

同样,市民精神支持网的平均规模也是 2.6,也大于其财务网,网络规模为 0 的被访者仅占 0.8%(4 人)。在城市,亲属和非亲属似乎发挥着同等重要的精神支持作用,因为平均 49.5%的网络成员是亲属。配偶的作用也表现得非常弱。虽然 85.4%的城市调查对象是已婚者且与配偶居住在一起,但仅有 22%提到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被提到的频率类似。在提到的其他亲属中,有 29%比被访者年长 6 岁以上,有 37.4%与被访者的年

表 3

城乡居民精神支持网的构成

	农村(N= 329) 典型网的 关系构成 (平均%) <sup>a</sup>	(标准差)	被访者提 到该关系 的%	城市(N= 498) 典型网的 关系构成 (平均%) <sup>a</sup>	(标准差)	被访者提 到该关系 的%
全部亲属	42.6	(41.5)	61.7	49.5	(43.6)	63.3
配偶	10.2	(20.8)	23.7	11.8	(27.2)	22.3
亲属	32.4	(38.3)	49.8	37.7	(40.9)	53.2
父母	7.9	(21.7)	14.6	6.2	(18.9)	12.7
子女	1.9	(11.5)	3.0	9.7	(24.4)	17.5
兄弟姐妹	12.9	(26.7)	23.7	13.1	(27.3)	23.7
其他亲属	9.7	(24.4)	17.6	8.8	(20.9)	19.1
同事	10.6	(25.3)	18.5	20.0	(34.2)	31.1
朋友	19.7	(33.9)	30.4	13.3	(29.3)	21.3
邻居	25.4	(36.5)	38.3	9.7	(24.6)	16.7
其他非亲属	1.8	(8.3)	5.2	7.5	(22.6)	12.5
网络规模 <sup>b</sup>	2.6	(1.3)		2.6	(1.4)	

说明: a 配偶+亲属=全部亲属;全部亲属+同事+邻居+其他非亲属=100%。

b 农村样本=334,城市样本=502,包括那些没有提到任何网络成员的个案。该样本数与表5的回归分析中网络规模变项所包括的样本数一致。

龄差距在5岁以内。在非亲属当中,同事和朋友的精神支持作用更大。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模式的类似性和差异性。但是,若想确定城乡居民在社会支持网构成上是否真正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就必须把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其他因素考虑进去。例如,表3的数字显示市民被访者比农民被访者提到了更多的亲属。但是,同农民相比,市民年龄较大,女性偏多,教育程度较高(见表1),所有这些因素或其中的某个因素有可能导致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中亲属关系的比例有较大的差别。所以,只有在控制了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等因素以后,进行多元回归或逻辑回归分析,才能发现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构成的真正差异。

表4和表5呈现了回归统计的结果。这两个表中的每一列代表一种回归分析。每一回归方程中的依变项是属于一种特定关系的网络成员的数目,例如被访者提到兄弟姐妹的数目。网络规模是另一个依变项。自变项是是否居住在农村地区。这个变项的正系数意味着农民更可能提到某种特定关系。控制变项是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等指标。例如,表4第1行第1列的数字-0.150表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以后,农村财务支持网的平均规模小于城市支持网,但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P > 0.05$ )。在控制了上述3个因素及网络规模条件下,我们运用回归统计的方法对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构成进行了比较分析(见表4、表5)。<sup>①</sup>

① 关于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如何影响个人网络模式的问题,将在另外的文章中专论。

表 4 显示城乡居民财务支持网的构成模式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唯一的例外是邻居,农民比市民更可能把邻居选作财务支持网的成员。然而,表 5 表明,虽然城乡居民在提及配偶时不存在什么差别,但市民比农民更可能在其精神支持网中提到亲属。在亲属的特定类型中,仅仅在选择子女关系时存在着差异。在非亲属关系中,农民比市民更可能提到朋友和邻居,市民比农民更可能提到其他非亲属(主要是同学)。

上述的研究发现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亲属在城乡居民的财务支持网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超过 60%的财务支持网成员是亲属。

(2)亲属在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也相当重要,但其重要性不如其在财务支持网中那么明显。事实上,近 40%的城乡居民在其精神支持网中并没有提到任何亲属或配偶。也就是说,亲属在财务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有程度上的差别,而这个倾向在农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3)在亲属中,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着比父母更大的作用,这种倾向特别表现在财务支持网中。子女在两种支持网中发挥的作用都非常小。配偶在精神支持网中发挥的作用也相当弱,只有不到 25%的被访者把配偶选作精神支持网的成员。

(4)同事和朋友在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比其在财务支持网中的作用更大。在农村,邻居在财务支持和精神支持两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 讨 论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对上述研究发现进行文化和结构两方面的解释。我们的研究发现:亲属关系在社会支持网特别是财务支持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说明家庭这种初级社会群体在人们的社会支持网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重要性并未随着宏观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而显著地降低,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表现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工具性支持领域。

由于家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它一直被许多学者作为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逻辑起点。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由社会关系构成的“差序格局”,即“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孝通,1947,28)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群是“小家族”,基层结构是由私人网络构成的。林耀华先生也曾说过:“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林耀华,1944,2)美国学者朗(Lang)指出:“家庭在中国比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被有意识的栽培并因而获得了更重要的地位。”(Lang,1946,9)确实,对家庭的义务和忠诚在其他社会中从未受到如此重视,有时中国人对家庭忠诚之重要性的强调甚至被置于国家之上。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重要机制(Yang,1959)。

亲属关系在财务支持网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庭义务和忠诚的强调密切相关。就从亲属中寻求财务支持的情况来说,人们往往以亲情交往的原则来处理这种经济关系。在他们看来,亲属之间的财务关系并不能按照精确的利益和市场原则来处

理,利益的分割越模糊,越能维持亲属之间的良好关系。对于亲属之间财务支持的施者和惠者而言,一般不需要正式的借据和担保人,也不需要支付相应的利息,发生经济关系的基础主要是双方的信任和义务。即使寻求财务支持的一方不具有偿还能力,但出于维持亲属之间良好关系的目的,往往也会提供一定程度的帮助。

除了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之外,制度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家庭关系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从结构层面上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某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家庭关系。例如,中央政府从50年代开始实行并基本未有变动的户籍管理制度及招工制度和地方政府近几年颁布的关于“农民工”流动的法规、条例,限制了城乡居民在空间和职业上的流动,致使家庭成员很可能长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城市或乡村。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住宅的相对短缺和经济体制转轨变形时期多数市民购买商品房的相对不足,也使一些城市居民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只能与父母、成年子女甚至已婚子女居住在一起。在我们的调查中,城市居民有32.4%与父母或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属(不包括配偶和子女)居住在一起,农村居民有27.2%与父母或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属(不包括配偶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简言之,中国城乡的亲属在居住上的地理邻近性,增强了他们之间在社会支持特别是工具性支持中的相互依赖性。

我们的另一个研究发现是,亲属在精神支持网和财务支持网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台湾学者熊瑞梅关于财务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的研究发现,亲属更倾向于提供财务帮助,而非亲属更倾向于提供精神支持,这与本文的研究发现一致(Hsung, 1994)。阮丹青、弗里曼等对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支持网的比较研究结果也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发现(Ruan et al., 1998; Ruan, 1998, 1999)。

那么,亲属在精神支持网和财务支持网中发挥着不同作用的原因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讨论中国家庭关系中的不平等结构。传统中国家庭制度的另一中心特征是严格按照年龄、性别和代际划分的等级制。朗指出:“父权制家庭既不是孔夫子的发明,也不是中国的独一无二特征,其他文明中也拥有父亲居支配地位和关系密切的家庭结构……;然而,中国家庭的独特性,也许是父权制家庭在历史上最极端的表现。”(Lang, 1946, 54)不同的家庭成员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中国传统家庭中,按其重要性来说,依次是父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夫妻关系。这种重要性完全是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来决定的。在传统的“五伦”中,涉及到家庭的就有父子、夫妻和兄弟三对关系。这三对基本的家庭关系,不仅在维持家庭延续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且每一对关系都是不平等的,前者对后者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在涉及到相当信任程度的个人问题时,如本文研究的“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这类精神性、情感性问题时,人们往往希望找一个地位平等的交谈对象,而不至于因为地位不平等从而使拥有权力的一方控制或干涉自己的私人问题。农民更倾向于到家庭之外寻求平等的精神支持对象,并不是他们的交往范围更广泛、交往观念更现代,而是他们在家庭范围内找不到足够的地位平等的交谈对象。这是不平等的家庭关系结构的直接后果。同家庭关系相比,与邻居、朋友和同事等非亲属的关系则更趋向于平等。总之,中国农村家庭关系的不平等结构影响了亲属之间的情感支持,而城市居民相对平等的家庭关系则促进了亲属之间的精神互动。这也许就是在寻求精神支持时市民更倾向于选择亲属,而农民更倾向于选择非亲属的文化原因。

至于被访者很少把他们(她们)的配偶选作精神支持的对象,也可能是由夫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造成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结果并非由于被访者在选择精神支持网成员时,忘记



了提及配偶。对“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项目中其他支持网的分析发现,在回答“重大生活变动问题的咨询”和“患病照顾”两个网络问题时,市民分别有 49%和 53%提到了配偶,农民则分别有 56%和 72%提到了配偶。

我们的第三个研究发现是,无论是在精神支持网还是在财务支持网中,邻居在农村的作用均比在城市更重要。对于这个发现,并不能仅仅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我们认为,这与城乡居民不同的居住结构和居住稳定性有关。在农村社区中,以居住地形成的地缘关系是非常稳固的(李培林等,1993)。除非到城镇定居,农民极少作出迁居的决定,由此形成了相当稳固的邻里关系。此外,在一个村落社会中,除了亲属之外,其他人均可归入广义的“邻居”范畴,特别是在规模不大的乡村更是如此。与此相反,城市居民的居住稳定性则不那么强。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以置换或购买住房为主的迁居对一些城市居民来说似乎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由此造成了城市邻里关系的相对不稳定。再者,农村以胡同里巷式的平房为主的开放式住房结构有利于邻里之间建立密切的交往关系,而城市以公寓式单元为主的封闭式住宅结构则容易形成“老死不相往来”的邻里关系。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民居住独院平房的占 98.9%,住大杂院平房的占 1.1%,而城市居民居住单元式楼房的占 80.2%。“守望相助”、“远亲不如近邻”等成语典型地反映了农村社区中邻里关系在社会支持中的作用。

在两种社会支持网络的构成中,均可以发现兄弟姐妹被选择的比例高于父母。对此发现,只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解释既不充分,也不令人满意。因此,必须考虑到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等结构因素的影响。在财务支持领域,父母的作用不及兄弟姐妹重要,与他们的平均经济收入的相对低下直接相关。由于子辈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平均高于父辈,以及他们的职业地位普遍高于父辈,造成了前者的平均经济收入高于后者。在本次调查中,城市居民 45 岁以下、46 岁以上两个年龄组的月平均工资收入分别为 517.3 元和 476.7 元。农村居民相对应的两个年龄组的月平均收入分别为 334.5 元和 325.1 元。是否选择某人作为其财务支持网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对方是否具有提供这种帮助的经济实力。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一代经济地位的下降必然会引起其在家庭生活中其他方面权威性的削弱。而在精神支持网中,选择兄弟姐妹的比例高于对父母的选择,与同辈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高于父辈有关。一般来说,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可能为寻求精神支持的人提供有效的帮助及实质性的信息。

在财务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中,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提到子女的频率更高(见表 4、表 5 的回归统计结果)。这个结果的产生与城乡居民不同的年龄结构有关。1995 年天津市市内 6 区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37.01 岁,市辖区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32.29 岁(天津市统计局,1996,第 80 页)。受年龄这一自然人口特征的影响,平均年龄较大的城市居民势必在提及亲属作为自己的财务支持网成员时,会更多地提到自己的成年子女。

最后谈一下朋友在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民比市民更可能在精神支持网中提到朋友,也即朋友在农民的精神支持网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这种差异是否确实存在,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与朋友关系界定的不精确性有关。与其他几种关系相比,“朋友”的界定最不明确,它往往是人们不能具体界定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时形成的一种模糊标签。无论城乡居民对“朋友”这个称谓的界定有何不同,但至少说明在大家彼此了解、相互熟悉的互识性农村社区中,作为一种单独的关系,“朋友”可能是提供精神支持的最大群体。因为在农村社区中,人们对社会角色的界定更不明确。除了亲属、邻居和少数相对不太固定的同事关系之外,其他的社会关系均可归入广义“朋友”的范畴。而在城市社区

中,由于长期的工作关系而形成的同事关系实际上扮演着朋友的角色。在城市居民的选择中,同事是提供精神支持的最重要的一种非亲属关系。在该调查中回答“谁是您的最好朋友?”时,许多城市被访者提到了同事。此外,市民比农民提到了更多的其他非亲属(主要是同学),而在农村样本中,则不存在类似的情形。如果把关系密切的同学也包括在朋友的范畴内,那么,在城乡居民精神支持网的构成中则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差异。

总之,本文对城乡居民的两种社会支持网的构成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分析,特别考察了不同社会关系在提供社会支持时的不同作用,并对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构成模式的类似性和差异性进行了比较研究,从文化和结构两个方面对这些研究发现进行了解释。希望我们的发现和解释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有所贡献。

#### 参考文献:

- 天津市统计局编,1996《天津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
- 阮丹青、周路、布劳、魏昂德,1990,“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李培林、王春光,1993,《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乡镇企业社会交换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 林耀华,1989,《金翼:中国家族制的社会学研究》(1944),三联书店。
- 费孝通,1985,《乡土社会》(1947),三联书店。
- 蔡禾、叶保强、邝子文、卓惠兴,1997,“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村居民寻求社会支援的社会关系意向比较”,《社会学研究》第6期。
- Bian, Yanjie.,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Blau, P. M., and Joseph E. Schwartz 1984, *Crosscutting Social Circl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urt, Ronald E, 1984, “Networks Items and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ocial Networks*.
- Burt, Ronald E, 1990 “kinds of Relations in American Discussion Networks.” in *Structure of Power and Constraint*, edited by C. J. Calhoun, M. W. Mayer and W. R. Scot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seru, Rose, 1991, *In Defense of Modernity: Role Complexity and Individual Autonom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nch, Janet, 1989, “Kinship and Friendship.” In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pecial International Report*, edited by Roger Jowell, Sharon Witherspoon, and Lindsay Brook. Aldershot/Brookfield: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 Fisher, Claude 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sung, Ray-may, 1994 “The Factors Affecting Emotional or Financial Support 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International Sunbelt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 New Orleans, USA.
- Lang, Olga, 1946,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arsden, Peter V,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Ruan, Danching, Linton C. Freeman, Xinyuan Dai, Yunkang Pan and Wenhong Zhang, 1997, “O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China.” *SOCIAL NETWORKS*, Elsevier, Netherlands.
- Ruan, Danching, 1993. *Social Network in Urban China*. Doctorate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 , 1998, “The Content of the GSS Discussion Networks: An exploration of GSS discussion name generator in a Chinese context”, *Social Networks*.
- Ruan, Danching, Xinyuan Dai, Linton C. Freeman, Yunkang Pan, and Wenhong Zhang, 1998,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s in China and the Netherlands.” (under review).
- Ruan, Danching, 199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tworks in Two Chinese Societies”, (forthcoming) in A. So, N.

Lin, & D. Poston (eds.) *The Chinese Triangle of Mainland-Taiwan-Hong Kong: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Ven der Poel, Mart, 1993, *Personal Networks*, Lisse: Swets and Zeitlinger.

Wellman, Barry and Barry Leighton, 1979, "Networks,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ies: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Community Question",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Wellman, Barry and Scot Wortley, 1990, "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 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Wellman, Barry, 1992, "Men in Networks: Private Communities Domestic Friendships", in *Men's Friendships* edited by Peter Nardi,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

Yang, Ch' ing-K' un, 1959,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张文宏系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硕士  
阮丹青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助理教授, 博士  
责任编辑: 张宛丽

## “第三届全国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联席会暨社区服务 与建设研讨会”在天津召开

1998年10月22—25日,“全国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联席会暨社区服务与建设研讨会”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召开,来自全国24个省市及全国妇联等单位的3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所长联席会议至今已连续召开3年,并正在逐步形成一种制度。几年来,它在交流各地社会学研究的经验和成果、加强区域性合作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与往年相比,本次会议有两个特点,一是与会者所代表的区域比前两次更广,连新疆地区也有代表出席,这表明了今天的社会学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受到普遍的重视;二是把所长联席会议和学术研讨会结合起来,这样便使得三天的会议更加充实,也更有意义。

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1. 探讨社会学以及各研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2. 交流各所科研工作的成果和经验;3. 组织双边和多边的区域合作研究;4. 参观、研讨天津市和平区社区建设。与会代表普遍认为,目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从总体上说对社会学是有利的,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机遇,但由于经费、人员等方面的问题,社会学的发展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同志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搞好学科建设,忠实地记载当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和内容;另一方面要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中去,要充分发挥社会学特有的作用,做好社会发展的预测工作。会议讨论并落实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牵头,地方社会科学院共同参与的“全国百强村调查”这一大型合作课题。期间,代表们参观了和平区老年公寓、救助中心等社区设施,并与社区负责同志就如何搞好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范广伟)